



1820-1949 洋镜头下的近代中国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
【英】保罗·法兰奇著 张强译

镜里看中国



没有他们走向中国，就没有中国走向世界
不同视角讲历史 解密细节辨真相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会长、教授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山东大学（威海）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

程曼丽

郭镇之

李彬

张威

刘宏

联合推荐

镜里看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

【英】保罗·法兰奇著 张强译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
记者 / (英) 法兰奇著；张强译. — 北京：中国友谊出
版公司，2011.7

ISBN 978-7-5057-2882-0

I. ①镜… II. ①法… ②张… III. ①中国历史：近
代史—史料 IV. ①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6521号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Copyright © 2009 by Paul Fren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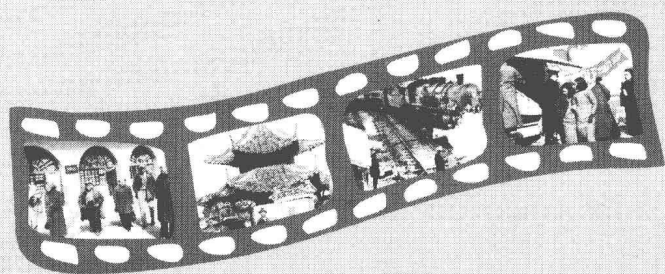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LTD

该简体中文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授予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1-4248

书名	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
作者	(英) 保罗·法兰奇
译者	张强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00×1000毫米 16开 21.75印张 260千字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882-0
定价	3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引.言



镜像中国

“他（驻华外国记者）处境艰难，比如没有固定的新闻来源，对同一事件持相同看法的人几乎不超过两个，比如总有立场各异的评论家们时刻准备着谴责记者，说他已经沦为宣传工具等等，诸如此类的难题不胜枚举。”总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阐明驻华外国记者遭遇的种种困难。

——《密勒氏评论报》（1928）

训练有素的记者本就应该能够一头扎进新的环境之中，而且无论传媒之河有多浑浊，都能探寻到真理之珠，轻松愉快并兴高采烈地浮出水面。如果这是普遍适用的准则，那么当我于1926年初第一次去远东的时候，就糟糕地发现自己是个例外。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一直错了下去……

——哈雷特·阿班，《纽约时报》

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人

这或许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但在许多方面，新闻工作者们确实是他们生于其中并将之诉诸笔端的社会的镜子。他们，试图以一种读者们可以理解的方式为其放映遥远国度的复杂事件。对于旧中国的驻华记者们来说，事实更是如此。

这类记者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鸦片商们在广州的工厂里。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是文稿数量还是记者人数，都达到了顶峰。不管是将新闻发回给他们远在欧洲、美国、日本或其他地方的雇主，还是给其供职的中国当地外人报刊，他们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报纸、杂志和期刊向世界报道中国发生的一切。与现在一样，驻华记者团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主流团体。

从起势甚微到如火如荼，驻华外国记者们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和发展，见证了中国的动乱和革命、改革和战争。这些记者们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几乎每一次都站在中国命运之重大转折的最前沿。他们目睹了鸦片战争，旁观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衰起落，见证了火烧圆明园，亲历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围攻和袭击，目睹了清王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诞生，见证了其为反对军阀混战、争取民族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以及日军侵华、共产主义的兴起等等，那时看到的不是战争，就是革命。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开放对外贸易；1900年东交民巷围攻战结束，八国联军增援部队占领北京；这两件事，外国记者团曾亲眼目睹。他们还曾见证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以及1919年5月4日带来的一个朝气蓬勃、政治上日趋激进的中国。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那时，旧中国的驻华记者们就站在血流成河的街头。1937年的黑色星期六，第二次淞沪抗战的动乱曾危及到他们的安全。从1931年日军入侵并吞



并伪满洲国，到轰炸上海、强占南京再到袭击国民党战时陪都重庆，他们一路跟随着侵华日军的足迹，与众人一道托庇于防空洞中，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与蒋总司令及其夫人品茗交谈，于延安窑洞拜访毛主席及他的同志。他们见证了从内战开始到结束后蒋介石逃往台湾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这一历史进程。总之，驻华外国记者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人，是全世界亿万民众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传媒人。

与世界各地的记者一样，驻华外国记者们立场各异，他们对中国持有自己的臆断和偏见，但仍有不少人对中国怀有希望和梦想。当然，他们并非永无过失，他们发布的消息并不完全准确，有时甚至错得离谱。他们中大多数人精明能干、精通业务，并对新闻工作满怀热忱，少数人甚至异常优秀，具有罕见的鉴别力和天赋。但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着人类固有的劣根性。酒鬼、浪子、骗子也不在少数，间或也有人是间谍，并且这种人绝不止一个。他们会变更立场，无视公正，心怀偏见，甚至有少数人是彻头彻尾的一流骗子和无赖。

旧中国的驻华外国记者，无论是在广州的工厂里利用手工印刷机印刷小报的早期记者，还是将文章用电报发回伦敦或纽约世界大报的外国记者，都怀有努力了解中国的愿望，并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跟读者分享他们的见闻心得，正是这种愿望几乎将他们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从19世纪20年代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种愿望从本质上使中国的“脉动”变得令人着迷、充满挑战。但他们集体在解读中国时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他们就像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爱丽丝在穿过魔镜之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鲜活的花园，在那里，她意识到没有哪条路能通往她想去的的地方，而一路的迂回曲折最终将她带向了意料之外的地方，且遭遇了不曾料想的邂逅：

“我应该可以把花园看得更清楚，”爱丽丝喃喃自语，“要是我能爬到那座小山顶的话。嗯，这儿有条小路直通小山——至少，不，它并不

通往那儿……”（沿着小路走了一会儿，拐过几个急弯之后）“但是我想最终会通往那儿的吧。可是，这路弯弯曲曲的，也太奇怪了！这哪里是路嘛，这更像螺丝锥呢。好吧，我想，这个拐弯应该通往小山那儿——噢，不，不是的！这又直接回到房子那儿了！好吧，我再试试另一条路。”

形形色色的外国记者

驻华外国记者的故事始于19世纪20年代两个编辑关于鸦片走私的争论，终结于一个友善的比利时记者在革命结束之后“竹幕”落下之时与他被围困的同事们的放纵狂饮。你可以写一本书，介绍一下驻华会计、律师或工程师的历史，但你无法找到比这些记者们更有趣的群落。驻华外国记者们个个头重脚轻根底浅，净是些各持己见、哗众取宠的个人主义者。与其他行当的从业者不同，他们多数时间可以四处游荡，尽管时不时会遭到清王朝、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明显的限制和敌意。他们有时在数周时间里都无法与外界联系，甚至几个月都收发不了邮件，又或者待在离电报站几百英里远的地方。只有条件允许，他们才可以写稿、发急件。他们经常把编辑折磨得焦头烂额，直到他们的电报或者信件最终送达。即使是那些在地方性报纸如上海的《字林西报》和《京津泰晤士报》坐办公室的编辑也时常会写些专栏文章，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而外出采访，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新闻。

为什么有那么多记者对中国感兴趣呢？就某些人而言，理由很简单，有可能是他们懂中文，有过在华的经历，也有很多是传教士的子女，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人称“小小传教士”；还有一些人原先从事与记者完全不搭边的职业，不曾想被派遣或者雇佣到中国，最终成为了新闻界的专家和中国通。比如汤姆·密勒，他曾经是纽约的一名戏剧评论家，后来被派遣到中国报道义和团



运动，最终成为20世纪初上海报界的传奇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前夕，卡尔·克劳也离开了《沃斯港明星电讯报》，来到上海，与密勒一起并肩作战；还有鲍威尔先生，追随密勒和克劳，从两人的祖籍密苏里州来到了中国。战争年代，时局动荡，这要求世界主流报纸对雇佣人员进行重新分派。比如1905年，尽管他当时仍供职于大清海关，司戴德却为路透社报道过日俄战争。还有“偶然的东方通”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曾是《纽约时报》首席戏剧评论家，后来因为褒扬尤金·奥尼尔的戏剧而被逐出百老汇，1941年被派遣到遭受日军围困的战时陪都重庆。总而言之，事事都有两面性，并非所有记者都对中国向往不已，也并非所有人都乐在其中。

很多人都是天生的冒险家，向往更有意义的生活。1831年，威廉·伍德放弃鸦片生意，转而创办报纸；1850年，上海的龙头拍卖商创办《北华捷报》；19世纪90年代，詹姆斯·利卡尔顿辞掉了美国新泽西州的教师工作，来中国做记者；也是在这一时间，加雷思·琼斯辞掉了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外交事务顾问一职，转而做起了自由职业记者，20世纪30年代他不幸意外遇刺，但凶手身份不明，只能猜测可能是苏联间谍抑或是日本雇佣兵。另外，拉尔夫·肖被派遣到上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晚，他买通关系从达累姆轻步兵团里逃出来，并当上了《字林西报》的记者，相比之下还是记者这个工作更让他感兴趣。

很多记者都靠这种充满刺激的冒险行径出名。几十年间，无数的战争新闻迷涌向中国。他们中包括杰克·伦敦，即自我冠名“秃鹰”组织的头，该组织由一群在满洲采访日俄战争的记者组成。除杰克·伦敦外，还有那些自称“汉口最后勇士”的记者，1938年他们聚集在被日军包围的汉口，目睹了汉口遭受日军的猛烈轰炸，以及国民党全线大撤退。继参与报道阿比西尼亚战争、西班牙内战和其他许多战争之后，他们又来追踪报道抗日战争。在国民政府撤到内陆并在重庆稳住阵脚后，更多爱好报道战事的记者，包括厄内斯特·海明威和玛莎·葛尔红，纷纷赶赴重庆捕捉新闻。对其他一些人来说，中国是他们未来

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重要中途站。文森特·锡安到中国的时候才27岁，但他已然清楚中国将会是他未来取得巨大成功的垫脚石，他在中国培养了“流动的贵族记者”风度。泰迪·白修德^①，也就是后来驻华外国记者团的老前辈，到中国的时候才23岁。大战期间，对于任何一位态度认真、有心迈向报业巅峰的跨国记者而言，在中国找份新闻工作，是必需的。

很多记者都曾对中国的各种问题有过研究，他们把探讨中国事务和从事新闻报道的热情糅合在一起。出生于中国的阿瑟·德·卡尔·索尔比是中国动植物研究权威，也是知名的《中国自然科学报》的创办人、编辑和所有者，从1912年起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关停报纸，他一直从事这一工作。长期在《京津泰晤士报》任编辑的H·G·W·伍德海德拥有丰富的中国和中国事务的背景。20世纪30年代，几近退休的H·G·W·伍德海德出任知名季刊《东方事件》的编辑。有的传教士也喜欢记者的工作；他们在偏远的中国内陆传教，百无聊赖的夜晚，他们会以通讯记者的身份给上海或者香港的编辑们提供中国神秘内陆的新消息。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造成自我流放者人数骤增。埃德加·斯诺在美国希望破灭，失业之后坐海轮来到中国；杰克·贝尔登在天津跳下船，用200美元和一块金表贿赂海关官员换取了上岸的机会。实际上，很多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失业者费尽心机来到中国沿海报业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人数之多让人惊讶。这群意志顽强的年轻男女急切渴望了解并用笔描写这个世界。其他一些人则是大革命中的难民。例如，多产的《字林西报》漫画家萨巴乔毕业于莫斯科的亚历山德罗夫军校，在布尔什维克党统治俄国之前，他是俄帝国沙皇军队的中尉，是一位将军的副官。年幼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他的波兰籍父母来到中国，他父母信奉马克思主义，因与布尔什维克政见不一而遭流放。爱泼斯坦15岁时，受雇于H·G·W·伍德海德，做了个小记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留在中国，1957年取得了中国国籍。

① 中文名白修德，译注。



从一开始，外国驻华记者都有各自的政治立场。费城人威廉·伍德在鸦片贸易受阻之后，于1831年创办《广州信使报》，会同大鸦片商威廉·查顿先前创办的《广州纪事报》一起宣扬自由贸易主张；此后，来中国宣扬基督教和上帝的传教士们也效仿他们的做法。至今仍有争议的中国第一位全职记者是G. E. 莫理循，人称“北京的莫理循”。尽管他远离祖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依然相信他是大英帝国的犀利喉舌。他的表现也没让英帝国失望。20世纪20到30年代，当天津的伍德海德毫不动摇地支持治外法权的时候，上海的J. B. 鲍威尔则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反对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由于他毫不掩饰的激进主张，鲍威尔遭到上海市政委员会的刁难，并被赶出了美国商会。

这些新闻记者的身上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观。有些记者同时也是忠实的托洛茨基分子，包括20世纪30年代为上海各大英文日报撰稿的南非记者弗兰克·格拉斯，供职于《北京人民论坛报》的雷娜·普罗姆，以及美国地产大亨之子哈罗德·艾萨克斯。另外一些记者则是斯大林主义的信徒。阿瑟·德·卡尔·索尔比因为对中国细致入微的描写而受到追捧，另一方面则因其身为上海法西斯的头领而备受蔑视。

长期以来，一些像卡尔·克劳、J. B. 鲍威尔、哈雷特·阿班这样的中国通和记者早都告诫中国要警惕日本对中国事务变本加厉地干涉。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记者如经营右翼杂志《远东评论》的乔治·布朗森·李亚则积极煽动日本向中国扩张。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记者，包括多年为《法兰克福报》和《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中国事务的忠诚的革命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公开维护中国利益的埃德加·斯诺，以及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无数放弃国民政府转而支持共产党的“温和主义者”。

当然，总有那么一些稀奇古怪的人。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最初主要在上海从事中国新闻工作，撰写文章、编辑报纸并创办了不少出版物，1909年他徒步到达西藏。另外，他还把在中国的所有见闻心得杂糅在一起，在加利福尼

亚创立了一种新奇的宗教流派。

目的各异的他乡人

两百年间，驻华外国记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旅居心态，这是在中国的任何其他社团都不曾有过的丰富体验。有些记者陶醉于中国的文化、语言或其他元素而流连忘返；有些人思乡心切，无心逗留，无论是从中国的码头登船返航还是在中国终老，他们始终当自己是异乡客；第三种人就是典型的中国沿海报业记者。记者亚瑟·兰塞姆在报道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中国，他提出的“上海心态”这一概念得到了这类外国人的认同，亚瑟·兰塞姆指出他们是生活在“密封的玻璃箱”里，即在受外国势力控制的中国通商口岸内享受特权生活。

这些沉溺于中国这种贵贱分明的人中就有项美丽。20世纪30年代后期，项美丽在上海过着典型的外国人的奢华生活，和她的恋人、花花公子作风的诗人邵洵美一起编辑前卫的中国杂志。项美丽后来成了邵的情妇，还吸食鸦片上瘾，不过后来又成功戒烟，她把这些经历写成文字向《纽约客》杂志投稿。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项美丽一样完成大跨越，但他们都对中国社会满怀同情之心。

中华民国成立后，密勒、克劳、鲍威尔都狂热地支持国民党。作为《大陆报》的创办人和主编，密勒是第一个将1911年的行动称为“革命”行动的外国编辑；克劳则获准为孙中山先生写传记，尽管并未完成；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被蒋介石誉为国民党最得力的对外宣传工具，尽管在鲍威尔看来这种恭维颇具讽刺意味。但他们的后继者如斯诺等都排斥国民党并拥护共产党，有意思的是，他们大多是在密勒、克劳，尤其是鲍威尔创办、编辑和经营的出版刊物上开始他们的新闻生涯的。尽管记者人数在不断增加，但在很多方面旧中国外国驻华新闻团体就像是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他们的

立场、人际往来以及使命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很多外国报人并不仅仅限于报道新闻，他们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不论期间他们支持何党何派——最终都归于直接参与到这个国家的事务及其发展中去了。数量多得惊人的在华外国记者都从评论员转变成了社会活动家以及各种势力的直接代理人。例如“北京的莫理循”就离开《泰晤士报》，变成了出尔反尔的“铁腕人物”袁世凯的顾问；著述颇丰的记者B. L.普迪南·威尔为许多军阀做过顾问，后因深陷一桩阴谋最终在天津街头遭人暗杀；汤姆·密勒离开上海，成为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一名说客；端纳开始也是替某个军阀做顾问，后来因为替蒋介石及其夫人出谋划策而享有盛名，被人称作“中国的端纳”。此外，哈雷特·阿班曾被称为“奉天虎”的大帅张作霖任命为新闻主管，阿班虽然对此深表谢意，但还是拒绝了这份工作。从开展新闻报道转变为中国各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表并积极为其游说，这在旧中国报业可谓司空见惯，对于美国记者而言更是习以为常。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一开始是为了追寻公正，即使有的话最后也都会变得一心为钱而摇旗呐喊。不管是希望维持现状还是支持革命，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都认为不能只是袖手旁观，仅仅报道新闻，而是衷心实意地认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当然，虽然有些人在中国仅仅待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但是这足以给他们留下了长久而生动的印象。《泰晤士报》英俊时髦的彼特·弗莱明仅凭几次短暂的中国行就写出了两本关于中国的经典——《独行中国》和《鞑靼通讯》，他本人也成了众多英国女性的偶像。1938年，英国作家奥登和伊修伍德仅在中国待了几个月，就根据回忆写成了《战地行》，书中对中国处在全面危机时的动荡情景有着动人心魄的描写，至今读来仍然极具震撼力。当然也有例外，像海明威和葛尔红对于战时在重庆的经历却一字不提。这些旅居者并不一定事先对中国有多了解，他们中大多数人来的时候对中国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不过他们有的对此直言不讳，有的却不太愿意承认这点。彼特·弗莱明是

个典型的例子，他曾经毫不掩饰地夸耀自己的无知：

中国拥有长达四千年有确切记载的历史。中国的人口估计有四亿五千万。中国比欧洲还大。这本书的作者只有26岁。他总共在中国也就待了七个月左右，他还不会说汉语。

另一些人则全身心投入到在中国的工作和富有成效的生活中。密勒、克劳、鲍威尔、爱泼斯坦、伍德海德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中国居住了20年、30年、40年乃至更多年。像爱泼斯坦小的时候就到了中国，消息灵通人士、记者罗伊·安德森是苏州大学创办人的儿子，他就出生在中国，尽管有些人对中国以外的地方甚至一无所知。有些人为了新闻事业而献身。比如，著名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托马斯·鲍尔比于1860年作为命运多舛的额尔金代表团唯一的记者见证了英法两国如何维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后来他遭人绑架，受尽折磨并在羁押中死去。在焚烧圆明园并且纵容部下大肆抢夺的时候，额尔金为自己辩护道：“如果我不为《泰晤士报》的记者报仇，我如何向该报交代？”

鲍尔比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在死去的记者中，《每日电讯报》的彭布鲁克·史蒂芬斯是在上海的旧街市上被日本狙击手打死的；1937年12月，勇敢的意大利记者桑德罗·桑德瑞在美国的“班乃号”军舰上身负重伤，该舰当时正从南京撤走美国人以及其他中立者，不料受到日本歼击机的猛烈轰炸；资深记者J. B. 鲍威尔因遭受日本人的折磨于20世纪40年代不幸逝世。

合理看待外国记者对中国的痴迷

回头看看19世纪20年代以来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或许对我们理解当时媒

体对中国痴迷的现象有些帮助。首先，审视一下那些在中国为报纸撰文、编辑和从事管理的人，以及那些在中国作短期停留并报道的记者，他们才华横溢、业绩斐然，令我们受益匪浅。尽管当今西方对中国也很痴迷，但仍不及当初的兴致盎然。

有证据表明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期间，越来越多的报纸版面都给了中国。1928年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有一位署名“其中之一”的作者写了《驻华外国新闻记者的工作》一文。作者开篇就写道：“过去两年时间各国报纸有关中国事务的报道所占据的版面很可能要比前十年多很多”。这位匿名作者所指的中国事务就是1926年蒋介石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力图打倒军阀，由国民党统一全国。当时各大报刊的情形都很相似。1928年，《纽约时报》周日版上号称“有关中国事务的专栏就有七八个”，这些都是记者哈雷特·阿班发回的报道，该报还用紧急电报催促他发回更多有关中国的消息。

不过，这种长篇累牍的报道并非总有新意。大约从义和团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开始，世界各地开始需要更多有关中国的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世界各大报纸开始派遣记者，也聘用从军队转行来的全职特约记者。正如“其中之一”说的那样，记者队伍开始壮大，至20世纪20年代急剧增加。一战后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危机四伏，饱受内忧外患，成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外国媒体海外派遣地。

毋庸置疑，在华外国报业从1900年到1937年其队伍规模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那个时候的杂志以及非学术性的期刊比现在还多。从有着很长经营历史的报纸，比如，J. B. 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到昙花一现的期刊，比如，埃德加·斯诺的《民主》，报刊数量时多时少，但相比如今少得可怜的严肃出版物而言，它们的数量始终不少。外国人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天津以及北京，创办、编辑和提供了为数众多的报纸，如今它们都已成为历史，除了在香港，再也没有像《北华捷报》和《京津泰晤士报》一类的外国报纸了。我们有理由相

信，尽管现在又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琳琅满目、竞相上架，但是在1930年至1945年间许多由旧中国报人撰写的畅销书还是要比从1990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的书要多。那时候还有好几家中国书报图书馆向读者开放。正如《泰晤士报》德高望重的 J. O. P. 渥兰德所说，“记得大部头（关于中国的书）挤满了书架……随着这些书如潮般涌来，人们不禁要问：买书的人都是谁呀？哪来这么多读者呢？”有关中国的书继续如潮般涌来。1937年，常驻上海记者厄尔·利夫受命开列一份书单，要列出10本新近出版的书籍，“以便能够很好地展示中国”，他写道：

在我编写的时候，我面前有一份包含400本书的书单，都涉及到中国以及远东地区。这其中包括拉尔夫·汤森德的《黑暗之路》，他是一个文人，得了肝硬化；M.亨利·查普利的《前往上海》，作者显然没有到过上海，书却以上海的白奴贩卖贸易为题材；另外，还有H. D. 盖博的《中国之变》，读者如果看这本书的话，一定会比数绵羊的方式更容易入睡。除了这些很极端的例子之外，有许多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但是我不能将它们置于“必读书目”之中，因为是10本便宜的书。

有趣的是，书单上最红的10本书好几本出于旧中国外报人之手，这其中包括埃德加·斯诺、冈瑟·斯坦、艾格尼斯·史沫特莱、H. G. W. 伍德海德以及临时自由记者赛珍珠，历史上他们都曾名噪一时。尽管按照要求只需要列出10本书，但是利夫接着开列了许多旧中国外报人写的书，借此来讲述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包括文森特·锡安、维克托·雅克宏多夫、甘露德、哈雷特·阿班和 J. O. P. 渥兰德等。我们仍然相信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畅销书要比现在外国记者或者中国人写的书更有销路。比如说，彼特·弗莱明因为1935年



写的《独行中国》而一夜成名，并在英国出版界引起轰动；卡尔·克劳于1937年写成《四万万消费者》，在后来的12年里一再重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卖得非常火爆。另外，爱丽丝·蒂斯代尔·霍巴特的《中国灯油》以及赛珍珠的《大地》都是30年代的最佳畅销书，它们雄踞畅销榜达数月之久，后来还被搬上银幕和戏剧舞台；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1937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月内重印五次。另外，巨星级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根据他们战时在重庆的经历写成《中国的惊雷》一书，第一版就卖出50多万本，也成为50年代有关二战的最佳畅销书之一。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版商觉得有关中国的图书市场已经饱和了，所以总有在华的外国记者抱怨那些出版商们连看都不看就直接把他们的稿子给毙掉了。由记者出身的人编写的关于中国的图书已不再受青睐。当初那些最爱出版此类题材的出版社，例如哈泼兄弟出版公司，即便在二战进行得最为激烈的20世纪40年代，也将此类书稿拒之门外，除非它们出自于家喻户晓的明星记者之手，或者由能保证其口碑和销量的知名报社编辑私下推荐。

现在的新闻界到底还有没有像当年那帮对中国饱含个人感情并将个人荣辱融入其中的编辑或报社老板实在值得怀疑。那帮人中不仅有像密勒、伍德海德、鲍威尔、苏柯仁那样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也有像亨利·卢斯这样的人，他的时代生活公司坚持报道关于中国的事情，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国是新闻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自己是“小小传教士”，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血液里已经流淌着中国元素，因此他深深地觉得这个国家的命运和自己息息相关。

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国从19世纪20年代到1949年之间是一个重大的新闻聚集地，需要了解当时的媒体条件和现在的媒体条件，两者无法同日而语，现在的媒体可以24小时滚动播放即时新闻并有互联网支持。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第一批英文报刊是为了让大众知道一些个人的主张，这些人包括为对华贸易而